



#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戴麗娟\*



人類歷史變遷過程中有很多偶然，我個人會走上史學研究之路就是一種偶然，但是深入了解法國文化卻可以說是年輕時的一種主觀選擇，也是興趣所在，專研法國史變成只是這個選擇的結果之一。如果當初在某個環節中有其他更強勢的選項出現，或有其他的阻礙，現在的我也許並不在學界發展，但也許還是會從事跟法語和人文有關的職業。我這樣的說法，看過雷奈導演的 *Smoking/No Smoking*，或是奇士勞斯基導演的 *Blind Chance* 的人應會了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解。為什麼會提到這些電影？因為當初就是在看了許多歐洲電影、演了荒謬劇場的劇作、又囫圇吞棗的瀏覽了一些看不懂的理論翻譯後，才決定在大學歷史系課程外，自行學習法語，並且在大學畢業後赴法求學。出國時由於已經對大學所教的歷史感到無趣而想轉修劇場課程，所以我想著要去的是有沙特、卡繆、楚浮、雷奈、羅蘭巴特、傅柯的國家，而且沒有拿學位的明確念頭，只想能學好法語。後來卻因為轉科系要從大一念起，且在公共圖書館閒逛時無意中讀到年鑑學派史家作品而對歷史重燃興趣，所以決定回到歷史系本科。在通過專科語言考試後進入巴黎第一大學碩士班就讀，然後又憑著碩士論文和一份匆促寫成的計畫書進入年鑑學派大本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至此費夫賀、布洛克、布勞岱、勒果夫、諾哈和其他法國史家的作品方成為我學習參考的對象。但歷史始終不是我唯一有興趣的事物，社會科學、文學、藝術都吸引著我，所以在選題時，我常常不自覺的走向跨領域的方向，也因此花費不少時間在摸索。就這樣，懵懵懂懂、跌跌撞撞，為了留在法國再多看看，我按著法國當時的學制陸續修了碩士、博士深造文憑、博士三個學位，也寫了三個學位論文，如此倏忽已過十年。過程雖然辛苦，但也在不知不覺中培養出以法國檔案文獻為基礎的研究能力。回國前夕，我還不清楚到底未來要做什麼，加上去國多年，與臺灣學界早已沒有聯繫。當時中研院史語所正好在徵求可以從事世界史研究的人員，我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投件應徵。幸蒙多位匿名審查人的肯定，我在 2002 年秋進入史語所，從此變成臺灣學界的一員。至此，與其說是我選擇了這個職業，不如說是這個職業選擇了我。對於我這樣異質背景的人，史語所提供了安定的研究環境，對此我始終感到幸運與感激。

個人這種非典型的學思歷程對於年輕學人會有幫助嗎？對於早已立志從事學術工作的人而言也許毫無用處，但對於還徘徊在多條可能道路上的學子來說，或許並非完全無益。從出國留學至今，有兩次比較重要的路徑抉擇影響了我至今的研究方向，兩次都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抉擇，但最後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結果，我因此想藉此機會提出與讀者分享。

第一次是在決定回到歷史本科、進入碩士修業階段，必須選擇研究題目的時候。當時我很快決定要修習法國史，這一方面是出於個人的興趣，另一方面是因為自忖對中國史的興趣有限、且未在大學階段累積真正的專業基礎，不如直接投入一個法國當地擅長的領域。這樣的考慮還包括資料取得和



參考的便利性：研習法國史所需要的材料可在當地取得，而且本身就是法文寫成，我既不用返臺找資料，寫論文時也不用再翻譯原始文獻，這因此似乎是個合理的打算。但是一個臺灣學生做法國史，能做出什麼名堂？這個問題不只老師心裡會問，連我自己也是。何況，法國學界注重原創性，研習法國史的學生又多如過江之鯽，我這個門外漢如何找到前人沒處理過的題目？本身做法國近現代史的指導老師認為我既然會中文，就算不做中國史，還是可以選擇一個跟中國有關的題目。我對於傳統的外交史沒有興趣、也考慮到自己讀手稿文獻的能力還有限，在經過一番搜尋思索後乃決定以法國報刊為基礎材料，選擇分析 1960 年代輿論中的中國印象，尤其是有關文革的報導。由於那個時代適逢法國六八學生運動、毛派分子在左派中崛起，這個題目跟我原本較熟悉的現代思潮有諸多關連。題目決定後，我除了上課修學分之外，都在圖書館看早期報刊微捲，就這樣看遍了四份大報和兩份重要週刊當時有關中國的報導，並且按規定在一年內完成了一百多頁的論文。過程壓力雖大，卻也獲得密集的基礎研究訓練。在此之後，我又陸續完成兩本分量更重的論文，一份是處理法國知識分子的第三世界主義思潮的誕生背景，博士論文則是處理法國人類學建制化的過程與殖民圈的關係。每一次的選題基本上都是針對前一個題目中令我深感不足的部分做更進一步、更上溯的發掘，而且每個題目都讓我接觸不同類型的文獻或檔案。畢業多年後，為了解決博士論文留給我的疑問，我又利用在法進修一年的機會，擴大研究範圍，最後將成果出版成法文專書《歷經殖民科學運動與解放殖民運動的法國人類學》。雖然我處理的題目之間未必成為一個體系，但我相信自己至此對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各類檔案文獻已有較全面的掌握。

就這樣，一個臺灣學生在法國研習法國史從一個令人產生問號的情況，變成是順其自然的事，我的專書也獲得法國學界的肯定。不過這樣的狀況其實在我回臺工作幾年後，已經讓我產生新的問號，這也就是我要談的第二個轉折。進入史語所工作初期，我原本延續自己已有的專長，處理純粹法國史的課題，也發表了幾篇文章。但是基本上我已經離開原始材料源源不絕的環境，也缺乏來自同領域學人的刺激（畢竟臺灣學界能在法國史領域與我切磋的同好還不多），自己在臺灣做法國史的意義感何在？我開始懷疑。為了能與研究中國史的同仁有更多交流，也希望能多利用在臺灣或亞洲地區即可取得的材料，我因此在七年前決定走出法國史，開始處理一些與中法科學與文化

交流有關的題目，尤其是以長期駐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為主要對象，探討他們在近代中國所主導或參與的科學活動。在此領域中，我陸續完成了有關德日進的史前考古活動、桑志華與北疆博物院、徐家匯博物院與震旦博物院的研究，並且以中文或法文發表成果。在現代生物學還未隨高等教育制度的引入而在中國生根前，這些早期的科學機構及其作為其實扮演了奠基性、啟發性的角色，但由於其資料多為外文，且不集中在某一國的檔案機構，所以研究起來並不容易。一般聚焦於本國科學家的中國科學史並不重視這些外國人的貢獻，此方面的研究因此有補白作用，也可適度修正以國別為範圍的科學史書寫角度。我在探索這些題目的過程中也發現，原本我以為的中法交流，其實常常是有多國人員參與的科學事業。未來幾年，我希望延續跨國智識交流的方向，對十九世紀後半的法國漢學發展狀況做一整理，重新評估幾位被後世忽略的漢學家所留下的知識遺產，目前針對國際漢學界知名的《通報》創辦人高第已經做了一些基礎研究，並發表了一篇法文文章。另外，對於首位以法文撰寫福爾摩沙史地通論的十九世紀外交官兼漢學家于雅樂，也將展開調查。隨著這些工作的進行，我希望能借重目前法國史、中國史、臺灣史的研究成果，但跳脫傳統國別史的作法，而以跨國、跨文化、跨宗教、跨領域的角度去探索近現代史上常有的多方交流個案。

整體而言，進入網際網路與數位化時代後，在臺灣進行西洋史或世界史研究的可能性已經大增，實際操作上也比以前更便利。我曾經遇見的困難，現在已不再是大問題。目前不僅中研院與各大學在科技部與其他各種經費支持下購置了相當多的經典文獻、期刊、報紙資料庫，許多歐洲社會福利國家也提供一些免費使用的線上資源。此外，在本地學習各種外語的工具比以前豐富，教育部、科技部、各類基金會補助短期或長期出國學習、進修的機會也遠比二十年前多。在這種情況下，空間距離、資料來源越來越不構成障礙，剩下的是語言工具、問題意識與研究視野的問題。我想，立足臺灣、放眼全球的世界史研究已經不是少數有國外長期留學經驗的人方能進入的領域，希望年輕學子莫妄自菲薄，並儘早培養自己的人文素養、精進自己的語言與分析能力、擴大自己的研究視野。在國際學界成一家之言，是我們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